

爱国主义教育丛书

近代中国反洋教运动



7.
256.8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爱国主义教育丛书

近代中国反洋教运动

司 卫 编著

目 录

一、基督教东来	(1)
二、殖民主义者的先锋、向导	(4)
三、传教士的大量涌入与洋教的发展	(10)
四、披着宗教外衣的狼	(15)
五、传教士无恶不作露真容	(19)
六、发出反洋教呼声 掀起反洋教运动	(23)
七、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	(29)
八、反洋教运动进一步扩大	(32)



C

367873

九、反洋浪潮势如潮涌 (36)

十、反洋教运动如火燎原 (41)

545518



一、基督教东来

世界上有三大宗教：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它们的创立历史悠久。公元1世纪起先后传入我国，最早是佛教，其次是伊斯兰教，后来是基督教。其中，伊斯兰教成为回族、维吾尔族等我国少数民族兄弟的特有信仰。基督教最初是比较统一的宗教组织，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出现了分裂。欧洲西部仍称基督教，欧洲东部改称东方正统教（简称东正教）。这就是东欧及俄国十几个国家把东正教定为国教的来源。

从3世纪以来，基督教会日益为剥削阶级所控制。主教们利用手中的权力，经商盈利，放高利贷，侵吞教会公产等，基督教日益腐化。卜伽丘的《十日谈》就是揭露基督教徒腐化堕落的代表作。16世纪宗教改革后，基督教再一次分裂。德国、瑞士、英国等国家统称只信仰耶和華一神的基督新教（即耶稣教、更正教）。法国、意大利、葡萄牙等国仍坚持信仰原基督教的天主教义。从此，基督教中又分裂产生了基督新教。两次大分裂后，基督教一分为三：天主教、基督新教和东正教。

基督教的三大教派进入中国的时间不同。远在唐朝初年（635年），基督教的一支——聂斯脱里派由波斯进入中国。当时称为景教。到了唐武宗时，发布了灭佛诏谕，下令毁灭天下佛寺，由此波及到景教。至此，景教告一段落。元朝兴起，基督教又传入中国。元世祖对宗教比较宽大，基督教在中国再一次盛行。1293年，意大利传教士乔伐尼·蒙高味若来华传教，并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召见。1298年，他在大都（今北京）修建

了中国第一座天主教堂，并广收信徒。到1328年，由他布道而信教者达3万人之多，连元世祖忽必烈的母亲都成了他的信徒。但是，随着元朝的覆没，传教士在中国惨淡经营的基督教，也再次销声匿迹，在中国居民中很少留下影响。

到了明朝时期，三大教派才相继传入中国。沙忽略是最早东来的天主教传教士。但他也仅仅是来到了中国广东沿海的一个小岛——上川。因为那时凡不得皇帝许可的人，一概不准入境。

在16世纪，一部分天主教徒受着文艺复兴的鼓动，随着商人的足迹和西欧殖民势力的扩张，图谋向东发展传教事业。当时，欧洲最强大的殖民国家是葡萄牙和西班牙。1557年，葡萄牙人获得了在澳门建屋居住的权利，澳门也就成为传教士渗入中国的第一座桥头堡。到1563年，在澳门的葡萄牙传教士达900余人。这些人都希望到中国传教，但因无法进入内地，只好都在澳门等待机会。那时的澳门已经成为非正式的居留地。

到1581年，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来到澳门。1583年，利玛窦获许在广东肇庆创立第一个天主教传教住院。1601年初，利玛窦进京朝见明神宗皇帝。他死后，万历皇帝还以北京二里沟佛寺及房屋38间、地基20亩赐为利玛窦葬地（即今北京城外教士公葬处）。利玛窦使得基督教在中国得以很大发展。1650年中国天主教徒达到15万人。崇祯末年，天主教已遍布在中国各重要地域，宫廷信教者也很多。

清朝在顺治和康熙初期，也很宠信传教士。第一个出任钦

天监监正的传教士汤若望，与顺治关系密切。顺治有时还到他的住处吃饭喝茶。顺治年间，天主教又获得很快发展。康熙时期是天主教在华传教的辉煌时代。康熙 1675 年曾御驾亲临北京天主教堂，并以御笔为教堂题词“钦天”二字。后来，所有在华的耶稣堂在鸦片战争前，都以此为题匾。

然而，由于欧洲天主教各派的“礼仪之争”，致使中国教民产生仇教心理。同时，由于基督教义日益显现出对中华民族固有的思想基础的威胁和天朝的尊严受到西方教士的侮辱，康熙实行了禁教措施。这就使得未领有朝廷印票的传教士被驱逐出境。教堂、教产也被剥夺。一些传教士弃教从商，潜伏内地，而那些有印票的耶稣会士，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受到器重了。中国人也不敢像过去那样自由出入教堂了。传教士的传教事业受到阻挠。自此，中国禁教长达 100 多年之久。

雍正在位时，也严格地执行了康熙的禁教命令。雍正曾经对教士解释了他禁教的理由：“你们都愿意使中国人成为教徒，……但是，如果这样，我们将变成什么样的人了呢？我们不很快就变成了你们国王的臣仆了吗？你们所招收的中国基督徒，已经只承认你们的权威，不承认任何别的权威了；在事故发生的时候，他们将只听你们的话，不听任何别人的话了。我知道，在目前，我们是无须惧怕这些的；但是当未来年间，外国船只来航中国海岸者以千百计的时候，事情是可能会发生的。”

乾隆、嘉庆时期，也同样继续执行禁教政策，致使传教活动几乎处于停滞状态。特别是乾隆帝即位后，更加严厉地执行

禁教政策。他曾对教士、教民进行了一次全国性的大搜捕。除禁教外，清政府又于 1757 年实行了闭关政策。禁教令一直持续到鸦片战争。但是，清政府在禁教时时紧时松，所以传教士的活动范围仍然很广。

二、殖民主义者的先锋、向导

基督教能够向世界各地传播，始终没有离开过社会历史发展的背景和当时政权的力量。

16 世纪时，欧洲进行了宗教改革。与此同时，西欧的殖民主义者也先后来到东方。西方新兴资产阶级把基督教作为他们的工具，海外传教事业日渐兴隆。葡萄牙人以欺骗的方式租借我澳门，以澳门为根据地，在中国沿海、内地通商传教并从事间谍活动。西班牙也曾在传教士的怂恿下企图派军队征服中国，只是因为力不从心而未能实现梦想。

18 世纪以后，西班牙和葡萄牙丧失了它们以前的海外霸权，法、英、美、德等国家相继成为基督教的“海外布道”的“护法”者，法国的某些传教士不顾中国禁教之令，深入中国内地。英、美也派出大批传教士留住在澳门、马六甲、新加坡等地，为进入中国作准备。

沙皇彼得一世执政时期（1682—1725 年），极为重视利用东正教以配合向东方扩张，曾多次派遣“教士”参加俄国商队来华秘密活动。

在沙俄尚未正式派遣传教士团来华前，沙皇政府曾经一再利用在华的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为其效劳。1675 年，俄使

与在北京的传教士南怀仁联系，窃取了一张中国地图和有关清政府黑龙江战区战略计划等机要情报。1688年，俄便以同样手段，又获取了有关中国兵力和武器装备的情报。

1818年8月，沙俄政府各布道团下达训令说：“今后的主要任务不是宗教活动，而是对中国的经济和文化进行全面研究，并及时向俄国外交部报告中国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在1823年俄国外交副大臣给宗教事务和教育部的信中说：“布道团神职人员应当从事中国人的农村经济、他们的家庭生活、农业等的情报收集工作。”1854年又重申“布道团的主要目的，在于通过新派到北京去的布道团监护官搜集有关中国及其领土的可靠情报。”东正教布道团的所谓传教活动，就是披着宗教外衣，到处搜集情报，盗窃机密或以“中国通”的身分直接参与沙俄侵略中国的种种不光彩的活动。

东正教自从传入中国后，就在北京成立据点。但他们并不像别的教派那样积极地发展教徒。从1715年起到1860年，在北京的东正教徒，包括定居的一些俄籍人在内，仅约200人，另外，在北京郊外以及哈尔滨、张家口、天津和汉口等地，也有少量的东正教徒，加起来也才300余人。由此可见，传教士来中国并不在于传教，而在于搜集情报和研究汉学两项活动。

俄国在使用武力侵占我国黑龙江大片领土之后，立即推行“边区俄罗斯化”的殖民政策，除对反抗者进行军事镇压外，还派东正教传教士前往为其服务。

自从1715年沙俄第一届“北京传教士团”（又称“布道团”）进驻北京后，又先后派遣了十二届传教士团来到北京。

他们的经费是俄国政府供给的，他们要接受俄国政府的指示。他们把刺探政府机密和搜集中国情报作为主要任务，尽心尽力地效忠沙皇。“北京传教士团”在中国起着俄国政府的官方代表的作用。沙俄正是利用东正教“打开中国之窗”的，而“北京传教士团”是沙俄枢密院与中国理藩院之间最早的官方联络站。1738年，随沙俄“北京传教士团”来京的“学生”罗索兴，就在其任翻译的理藩院中盗窃了一份详细的中国全图，转呈给沙俄枢密院。其中还有一随团“学生”，在一年之内就向俄国天文台提供了长达231页的中国气象情报。

当清朝国势日趋衰微的时候，欧美资本主义的发展却非常迅速。英国在17世纪中叶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18世纪末叶又开始了产业革命，机器工业逐渐代替了工场手工业。19世纪初，英国的工业得到了很大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的国家。马克思指出：“掠夺是一切资产阶级的生存原则。”英国资产阶级对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中国垂涎已久，早就处心积虑地要打开中国的大门。英国为了扩张其殖民势力，曾专门训练一批传教士派往外国，利用他们作为殖民工具。著名传教士马礼逊就曾供职于英国的殖民机构——东印度公司，他在英国对华进行经济掠夺中起了积极作用。马礼逊是西方殖民国家基督教新教派来中国的第一个传教士。

美国是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达到对外殖民扩张的目的，美国也积极地派传教士进入中国为其对华侵略政策服务。

由此可见，西方列强从一开始就把传教士作为侵略中国

的一个重要工具。欧美各资本主义国家利用传教士来实现政治的、经济的目的，他们在近代各资本主义国家侵略中国的血腥历史上，表现得最为突出。

英、美基督教在华传教士于 1840 年鸦片战争之前的 20 多年间，特别是在战争前的四、五年间，主要有两个方面的活动：一是搜集情报，大肆鼓吹采取强硬的政策来叩开中国大门；二是在中国为开展传教作准备。这两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

在搜集情报方面，传教士郭士立是个很突出的人物。从 1831 年到 1838 年期间，他曾到中国沿海侦察至少 10 多次。第一次他乘坐一艘中国商船于 1831 年 6 月 3 日从暹(xiān)罗出发，沿途经过福建、浙江、山东、一直到达天津。一路上，他仔细地刺探了中国的军事、政治、经济情报，于同年 12 月 13 日返回广东澳门。驻澳门的英殖民机构——澳门东印度公司的一些负责人在听取了郭士立第一次到沿海侦察的报告后，非常高兴。为了获得更加全面、详细的情报，他们请郭士立和 1 名懂测量河道、海湾和绘制航海图的人员乘船秘密到中国沿海进行了 6 个多月的侦察活动。窃取了中国厦门、福州、台湾、宁波、上海和山东沿海等地的大量经济、政治、军事情报。一路上还探测航道、测绘海域图，并对各个港口的防务、商业等情况进行刺探，了解了清政府经济落后、布防及军备松懈等情况，为后来发动鸦片战争作了充分的准备。

郭士立到达上海时，不顾清政府的禁令，用了 19 天时间在上海搜集了大量的军事、经济情报。他在当时的《日记》里写

道：

“〔1823年〕六月三十日 上海 我们巡视了〔吴淞口〕炮台的左侧，察看了这个国家的防务内部组织。炮台是一座极为巨大的结构。他们尽了最大的努力作了布置，可是最蹩脚的军队也能攻破它，因为他们不懂得炮台工事的技术，全部依赖于壁垒和围墙的厚度。……火药的质量低劣，炮的保养和使用都极坏，点火口太宽，制造得不合比例，我确信有些炮对炮手们要比他们所瞄准的敌人更加危及性命。由于中国长时期享有和平，所以，他们的军事工作已经陷于腐烂。……我们还巡视了兵营，……我们看到弓挂在墙上，没有发现箭，据他们说，箭存放在对岸。他们的武器极不一致，有些士兵有大刀，其余的有火绳枪，少数有矛，等等。他们所属的分队用大字写在他们的外套上。……大部分军官都是没有受过教育的，是从部队里升上去的。他们的工资很低，收入极少，他们的地位一点也不值得羡慕。许多将官都是满人，享有极高的工资。同有些文官一样，只要中国的这种和平局面继续下去，他们的官职不过是一个闲差使。”

郭士立等人到吴淞口炮台刺探情报，遇有军人拦阻时，就拿出预先印好的基督教传教小册子散发，借口说是来传教的，以此掩人耳目而侦察防务。郭士立就这次侦察向东印度公司和英国政府作了详细汇报。后来，许多鸦片商人都争着请他带路到中国去推销鸦片。

为了使外国人更多、更方便地了解中国情况和鼓动殖民统治者对华战争，美籍传教士裨治文在广州创办《中国丛报》，

成为殖民统治者侵略中国的喉舌。

1835年初,《中国丛报》公然发出了战争叫嚣:“当为了取得公正、提供保护和维持一个国家的国格而有必要使用武力的时候,这样一种手段永远不会受到谴责。……根据中华帝国目前的态度,如不使用武力,就没有一个政府可与之保持体面的交往。”

1836年初,《中国丛报》刊载了《与中国订约——一个巨大的迫切要求》一文:提出了使用武力迫使中国订立不平等条约的主张。该文写道:“最近在沿海的侦察证明,天朝的联合舰队无能力驱赶一艘只配备数名欧籍武装人员的商船。我们已经见识过一些他们自吹自擂的英雄们,可以断言,英国兵只要一个团就可以击退几个省的军队……”

“中国,虽然是一个辽阔的国家,有3亿6千万众多的人口,却是一个极端孱弱的国家。……采用低声下气的请求,我们必将一无可获;倘若我们希望同中国缔结一项条约,就必须在刺刀尖下命令它这样做,用大炮的口来增强辩论。……在缔结条约时,必须重视获得使英国使臣能常驻北京的权利。要确定一个固定的关税,废止公行的垄断,完全准许我们在所有沿海有海关的港口和京城里通商……”

传教士在鸦片战争前夕,利用《中国丛报》向西方列强提供了大量情报。其中包括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地理、文化、气象以及从清廷到地方官吏的情况。特别注意报导关于中国的时事,中国进出口贸易数字,中国对英交涉的评述,译载重要文件如清帝上谕、大臣奏折,以及英、美商人对这些文件的评

论等等。《中国丛报》在西方列强制定侵华政策中起着提供情报的作用。

此外,还有一些不知名的传教士,为英国侵略者搜集情报也是不遗余力的。有个传教士把吴淞江通往内地的航道图秘密送给英军。参加侵华战争的英兵曾供认:“我军从一些传教士方面,获得了不少消息,知道中国政府认为我军一定沿着白河,要向北京进攻。传教士传递消息说,自从宁波为我军攻陷后,清政府即用上一切力量,在预料我军所要进攻的道路上布防,建筑起各式各样的障碍物。清政府把天津看成是北京的一个海港,因而特别重视天津,希望将天津变成头等的防御阵地。”

这个英兵还说,居住在长城口外(属热河)一个驻有清军的边界镇市上的传教士,把当地许多村庄铸造的铁炮运往天津的情况密告英军。传教士与侵略者是息息相关、血肉相联的。英军对传教士的活动给予极大的支持和帮助。

传教士为殖民统治的扩张侵略提供了最早的信息和依据,成为殖民主义侵略中国的向导。鸦片战争开始后,他们跟随在侵略军身后,享受着侵略者用枪炮给他们带来的传教特权。

三、传教士的大量涌入与洋教的发展

早在明末清初,意大利、法国、荷兰、俄国等西方国家的传教士就已进入中国,建立传教据点,不过人数不多,活动的规模也不大。而1840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从根本上改变了这

种情况。传教士和侵略者密切配合，用欺骗和恐吓，刺刀和枪炮强迫清政府与侵略者签订了一个又一个的不平等条约，为传教士踏入中国扫除障碍，打开大门。他们举着十字架与端着刺刀的侵略军一起为殖民主义的扩张效犬马之劳。在殖民统治者的眼里“一个传教士抵得上一营军队”，他们认为“与其设立几个军事据点，不如设立几个教堂更为有效”，“在殖民地修建教堂，驻扎传教士，就像在殖民地修建兵营，驻扎侵略军一样必要。”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侵略军实现了传教士们：“只有战争能开放中国给基督”的信念。美国长老会教士倪维思曾说：鸦片战争“是按神意用以开创我们与这个大帝国关系的新纪元。”

1842年，清政府在战争失败后，被迫签订了屈辱的《南京条约》。条约的起草人就是一位传教士——小马礼逊。条约的中文稿出自于另一位传教士，那位搜集情报的能手——郭士立。英国侵略者的胜利使传教士们看到了“曙光”，他们认为可以到中国城市的大街上，提高他们的嗓门大喊大叫的日子了。1842年2月14日，一个传教士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给国外的传教士写了一封很“自豪”的信。信中说：

“大炮在天朝呼啸，……城市在征服者面前一座接一座陷落。……这是政治提出的要求，是大炮迫令其实现的。

一次我信步走到一个城门口，城墙上似乎永恒地写着：洋人莫入。……我是一个洋人，又是一个传教士，我看

到了城上写的那句话，可是我不顾一群在场中国人的惊诧，闯进了城门。

时候已经到了，我们已沉默到今天，现在是可以到中国城市的大街上，提高我们的嗓门大喊大叫的日子了。”

不仅如此，法国统治者看到英国借《南京条约》从清政府手中获得巨额赔款并占有香港，还享有五口通商、领事裁判等权利后，非常羡慕。法国传教士也蠢蠢欲动。1843年，法国传教士安若望就向巴黎发出呼吁：“法国屡屡参与其他并不重要的外交事务，不惜花费巨款，派遣舰队和军队，如欲为我们取得在华传教的自由，岂非轻而易举？”法国传教士古伯察也表示：“既然英国可以为了维护少数商人的利益，毫不迟疑地派遣军舰追偿几箱焚毁了了的鸦片的损失，法国的传教士受到迫害、残杀，法国为什么不可以进行有效干涉呢？”

1844年，法国用枪炮威胁清政府，迫使清政府和法国签订了《黄埔条约》，允许外国传教士可在通商口岸建立教堂。以后，法国传教士便更加活跃了，也更加猖狂了。

与此同时，美国传教士也趁火打劫，利用清政府由于鸦片战争失败而产生的惧外心理，以武力威胁清政府签订了中美《望厦条约》，其内容比《南京条约》更为苛刻：“除了传教士能在五口传教之外，还可以建立教堂。”这是基督教传教士得以在中国公开建立教堂之始。传教士们认为应该大踏步地跨入中国了。他们叫喊道：“（中国）这个国家事实上已经落入我们的手中，一切早已在中国的传教士和各自国内的差会，如果他们不去占领这块土地，不在18省的每一个中心取得永久立足

的地方，那将是有罪的。”

此后，大批西方传教士，举着十字架，与西方商品和资本一样，像决堤的洪水一样，涌进中国。

中法签订的《黄埔条约》允许外国传教士可在通商口岸建立教堂，使得长达百年多的教禁开始解冻。但是，条约还没有自由传教的规定。以后在传教士的要求下，法国政府向清政府提出要求开放“教禁”，自由传教。1844年，道光皇帝下了一道手谕，对天主教准开教禁。其后，由于基督教各差会要求享受同等权利，耆英被迫于1845年2月下令准予一体适用。从此，天主教各修会和基督教各差会传教士纷纷前来中国，以通商口岸为基地，伺机潜入内地活动。因1844年，道光皇帝的朱批仅是传教宽容，并不允许教士们进入内地传教。清廷再三申明，传教士“只于通商五口地方建堂礼拜，断不越界传教。”所谓“断不越界”，是指不准逾越条约中所议定的各通商口岸的界址范围；即使是在口岸范围内传教，也必须是“以早出晚归，不准在外过夜为断”。对这种限制自由进入内地的规定，不但传教士不满意，就连西方各国政府也深为不满。为了取得深入中国内地的特权，以英、法为首的侵略者便设法寻找新的借口，酝酿发动新的战争。作为殖民统治者对扩张侵略的先锋、向导，传教士想方设法加深对中国内地的渗透。

在侵略者的步步紧逼下，道光皇帝在1846年2月20日发布上谕：“所有康熙年间各省旧建之天主堂，除改为庙宇民居者毋庸查办之外，其原旧房屋各勘明确实，准其给还该处奉教之人”。此后，各国天主教的修会来活动。基督新教各差会

传教士还云集香港讨论如何“进军”中国及划分传教区域范围等问题。不久，东正教也把外交职能和传教分开，由北京向中国各地扩大自己的传教势力范围。

但是，虽然传教士的活动较以前自由了一些，但道光皇帝的上谕里仍规定了“外国人概不准赴内地传教”，所以，为了更自由地活动，法国政府和传教士，这个在中国近代史上制造了多起教案的肇事者，便寻衅滋事，于 1856 年以法国传教士马赖在广西被杀之事为借口，联合英国发动了对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战争以清政府屈辱投降，签订《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而宣告结束。《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的签订又进一步扩大了侵略者的特权。

据史料记载，从 1844 年中法《黄埔条约》起，到 1858 年《天津条约》签订的 15 年间，天主教、基督新教违约非法潜入中国内地的至少有法国、英国、意大利、葡萄牙、美国、西班牙、德国等 7 国的传教士。其活动地区从黑龙江到广西，从山东半岛到青藏高原，从城镇到乡村都留下了他们活动的痕迹。

到 1860 年，基督教传教士从 1844 年的 31 人增加到 100 余人，教徒从 6 人增加到约 2000 人；到 19 世纪末，传教士增至约 1500 人，教徒增至约 80000 人。英国势力占主导地位。到 19 世纪末，英国传教士占 50%。从 19 世纪 80 年代起，美国势力开始增强。到 19 世纪末，传教士增至全体传教士的 40%，其余 10%是来自西欧和北欧。

这时期，东正教也积极发展传教势力范围，并逐渐形成了独立的教区。